

●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 青年卢卡奇的文化哲学初探

王 雨 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作者简介] 王雨辰(1967-),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青年卢卡奇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科学主义的实证论式的解释模式,形成了以“总体性辩证法”和“实践”为基础,以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识批判为核心内容,以捍卫人的价值和自由为基本价值趣旨的文化哲学。青年卢卡奇的文化哲学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原则,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 文化哲学;总体性辩证法;物化;阶级意识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267-07

青年卢卡奇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为了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机械决定论、实证论的解释模式,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以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意识批判为核心内容的文化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文化哲学的内涵及其价值趣旨应作研究和评析。

—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唯科学主义的理论解说,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是由“经济必然性”所决定的自然过程,忽视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和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因而无法抵御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造成“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欺骗,造成了工人阶级的主观革命意识的匮乏和阶级意识的危机,最终导致了西欧革命的失败。对此,卢卡奇指出,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洞悉历史的本质,对抗“物化意识”的侵袭,找到人自由解放之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卢卡奇首先批判作为唯科学主义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总体性的辩证法”。

卢卡奇认为,一定的理论必须以一定的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性质直接决定了理论本身的价值趣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之所以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证论解说,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站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把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直接运用于哲学研究中。卢卡奇指出:对现实的一切认识都应该从“事实”出发,但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却决定了“事实”的不同意义。当时的经验论者希望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事实采取“不偏不倚”的研究,而机会主义者则力图求助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对抗革命的辩证法。针对这两种倾向,卢卡奇认为,主张对“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纯客观研究,

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解释“事实”的意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是把它所要研究的“事实”，从“事实”所处的环境中抽象出来，孤立静止地看待“事实”本身。这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当然也受到了机会主义者的赞同，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研究方法和马克思辩证法的对抗性。卢卡奇由此分析了这种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质及其危害。

在卢卡奇看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实际上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不断“合理化”，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分工越来越严密，生产过程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被“片段化”，其结果是出现了许多“孤立的”事实和事实群，单独的专门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也形成了与之对应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把所要分析的“事实”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总体中抽象出来，孤立地考察这些“事实”，从而把这些“事实”看成是孤立、永恒不变的、静止的东西，否认“事实”的历史性质。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家出于阶级立场的局限，总是用实证主义方法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在永远有效的范围内来理解其生产制度，并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决定的，是永远存在的东西，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看成是与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无关的纯粹表面现象。因此，卢卡奇指出：“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这种错误来源的实质在于，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sup>[1]</sup>（第 54 页）。建立在这种研究方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会无批判地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它的内在结构，最终钝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向度。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决不是这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是“总体性辩证法”，这种方法是历史地分析和了解社会关系为出发点的。卢卡奇正是通过阐述“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表达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卢卡奇认为，“总体性范畴，整体对于各个部分的全面、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sup>[2]</sup>（第 76 页）。它具体包含以下几种含义：

首先，“总体性”是一种具体的总体性。它一方面是在最高的思维形式中再现事物的整体联系，同时又保留个体的特殊性存在和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部分在总体之中，又保留其个体性，但总体具有优于部分的地位，部分只能在与总体的联系中才能显示出其意义。因此，总体范畴要求对社会生活进行总体的、全面的理解，孤立的个别事实只有在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卢卡奇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为例，指出总体性的辩证法同资产阶级实证主义方法存在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方面使一切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性质达到了极点，把整个社会描绘为只有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存在，创造了一种以最纯粹形式存在的思想环境，但另一方面，当这种思维方式刚要产生结果，形成理论的时候，它又立即化成了幻影。因此，这种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把现实构造得如此的“不科学”，但它却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惟一方法。

其次，“总体性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与统一的辩证法，它仅限于社会历史领域，因此它是研究社会历史中主、客体运动的概念。卢卡奇认为，在总体性中，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割地相互依存的，否则总体性就不会存在。总体性只有把主体自身作为一个整体时，才能真正把客体当做一个整体来认识。马克思的“总体的辩证法”是通过超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而形成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奉行逻辑的思维方式，把凡是不符合理性原则的，都排斥在哲学体系之外，因此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主—客体的分离，特别是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更是如此。卢卡奇指出，尽管康德的哲学想努力弥补这种主、客二分对立的状况，但由于他脱离了社会历史，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因而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和对立并未消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认识仅归结为对现象的认识，而达不到对物自体的认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把主、客体对立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人内心的道德评价，实际上这种统一实际上是人内心中的统一，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统一。黑格尔虽然开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解决主、客体的关系，他承认“历史”的重要性，把整个存在，包括我们的历史都看做是我们自己的产物，我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产物，这样主体和客体就不是对立的而是统

一的。同时黑格尔还认为应该把历史放在具体的总体中予以考察。但他却将主体归结为绝对精神,并未找到真正的主体。只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重新思考了哲学的原则,实现了哲学中的“实践”的转向,并真正将主、客体关系问题置于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予以考察。从此,主体不再是单个的人或精神,而是集体的主体,即无产阶级。客体也不再是僵死的、和主体无关的客体,而恰恰是主体实践的产物。“实践”成为联系主、客体的中介,自然客体变成了历史客体,单个主体变成阶级主体。这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总体性方法的革命性之所在。

通过以上论述,卢卡奇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认识,并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因此,无产阶级是历史中的主体—客体的统一。无产阶级要真正成为历史的主、客体的统一,就只有运用“总体性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批判、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才能把握历史运动的基本趋势。

## 二

如果说“总体性辩证法”是卢卡奇为了消解科学实证论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价值功能的话,那么,把这种“总体性辩证法”运用到当代社会现实中,就形成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物化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西方人异化的真实境遇,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日益被割裂的深层反思,也体现了卢卡奇对人的价值和命运的关怀。

卢卡奇指出,所谓“物化”主要是指“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sup>[1]</sup>(第147页)。这种“物化”既体现在客观方面,也体现在主观方面。从客观方面看,是由人们劳动所生产出的物以及物与物关系所组成的商品世界,其规律虽然不断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它却作为一种与人相对立的力量而存在;从主观方面看,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而被客体化,变成成为一种商品,并且不依赖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物化?卢卡奇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历程寻找“物化”发生的历史根源。

卢卡奇认为,“物化”实际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要求的不断的“合理化”。卢卡奇这里所讲的“合理化”这个概念来源于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中,把社会现代化归结为“合理化”的过程。他认为,尽管人们的行为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利益所决定,但是决定人们行为性质的却不是物质利益,而是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理想等精神因素,正是这种精神因素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通过宗教改革运动,发展出一种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新教伦理。在新教伦理的支配下,西方社会建立了在理性基础上的劳动组织方式、政治法律体制,从而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持。整个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和行为”的不断“合理化”的过程,通过这种不断的“合理化”,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组织程度和制度越来越严密,形成了日益严密的“科层制”的管理体制,这虽然保证了社会运行的效率,但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随着“合理化”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人的自由和意义日益丧失。因此,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划分为“形式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质理性”(价值理性),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理性”的不断增加,这种“形式理性”虽然注重了效率和科学管理,避免了时间和金钱的浪费,但它又是以意义和自由的丧失为代价的。当然,他是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出发,认为现代社会实际处于一种“二律背反”的难题中。可以看出,马克斯·韦伯实际上是把“现代化”归结为“合理化”,但是这种“合理化”是一种“形式理性的合理化”,以牺牲“价值理性的合理化”为前提、为代价,他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把这种矛盾看成是现代社会难以取舍解决的两难问题。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接过了马克斯·韦伯的话题,结合他对马克思著作的研读,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自由的丧失和价值的贬损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其理论的价值趣旨在于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

卢卡奇指出,“物化”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综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厂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sup>[1]</sup>(第 149 页)。人的个性特征的被消除是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具体说,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的需要,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被简化为一种机械化重复的专门职能;其次,随着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加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演变成为可以用客观计算的、和工人相对立的“劳动定额”来加以衡量,这使得人的个性人格同人本身相分离,被结合到合理化的专门系统中,并最终归入到“计算”的概念中。卢卡奇系统地分析了“可计算性原则”的广泛实施,对于劳动过程中主、客体的影响。

卢卡奇指出,要对劳动产品所应达到的结果作出精确的预先计算,只有通过把劳动产品这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才能实现。由于对劳动过程的合理—计算的分析,劳动的过程变成了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这些局部系统的统一性纯粹由“计算”所决定,这种局部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就是偶然的,并最终破坏了劳动产品本身的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卢卡奇进一步分析了“可计算性原则”的广泛实施对于劳动主体的影响。他指出,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人们发现这些机械生产体系是完全不依赖于他们而运行的,并且人还不得不服从它运行的规律,人不再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人的劳动也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一个旁观者,人最终成为了一个隶属于机器生产体系的“原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整个社会都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这使得“合理机械化”和“可计算性”原则成为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可以说,工人阶级物化的命运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因此,卢卡奇认为整个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物化”的社会。这种“总体物化”必然会渗透到人的意识中,并最终形成“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具体体现在: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化”相适应,建立了一套科层制(官僚)管理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机械的、依附的工作方式。由于“物化意识”的盛行,工人阶级丧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现实的批判、改造能力,造成了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顺从和适应的态度,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不再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而是历史过程中的旁观者。自然,这也就无法实现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从物化的生存状态和物化意识中摆脱出来呢?卢卡奇认为摆脱物化的力量就在无产阶级身上。

### 三

由于“物化”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中,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物化”导致了主体、客体的分离,导致了总体的破裂与个体的原子化。但是,正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所造就的世界破碎化和个体原子化中,人们充满了对“总体性的渴望”,由此,无产阶级通过运用自己的阶级意识,摧毁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及其物化意识,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物化意识”本身的虚假性,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可以说,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解放自身的重大历史作用,那么什么是阶级意识呢?卢卡奇指出,阶级意识并不是个别阶级成员来自经验的心理意识,而是整个阶级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生产过程中特殊地位的认识。“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sup>[1]</sup>(第 104—105 页)。可见,卢卡奇所说的“阶级意识”并非是本阶级个人的思想、感觉及其总和,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意识,而是本阶级对自己社会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科学反映,它是由某一阶级所处的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它在阶级斗争中,往往制约着阶级力量的强弱,成为阶级斗争成败的关键。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对自身的阶级利益、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觉认识,是对社会历

史总体的科学认识,具体而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sup>[1]</sup>(第133页)。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即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比,它具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

他指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当时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血缘关系,社会远未被组织起来,社会还未呈现出总体性的特征,再加上当时存在着许多社会等级和阶层,社会等级阶层利益掩盖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地位意识”或“等级意识”妨碍了自觉的阶级意识的产生。资产阶级虽然是自觉的真正的阶级,但是他们的阶级意识也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的总体和本质,这是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因为,当资产阶级在还没有打败封建主义的时候,他的敌人无产阶级就已经出现了。它使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进行反对社会等级制组织的斗争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必然变成一种新的压迫。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斗争日益纯粹的形式进行,但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则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把阶级斗争的事实从社会意识中抹去。因此可以说,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决定了其阶级意识的局限;同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资产阶级一方面赋予个性以前所未有的意义,又通过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任何一种个性。资产阶级的这种矛盾状态决定了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必然会创立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的学说,并且使自己相信和意识到自己的职能就是进行这种统治和组织。这些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的学说,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意识”,根本不可能把握社会总体发展的实质。

卢卡奇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能够揭示社会的本质,达到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无产阶级的优势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和实践是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sup>[1]</sup>(第127—128页)。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形成把握社会历史总体的阶级意识,这是由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对于无产阶级的这种历史地位,卢卡奇指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它消除了所有自然障碍,把人与人的全部关系变为纯粹的社会关系,但是资产阶级却仍拘泥于商品拜物教,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用僵化为一成不变的物的关系,这样资产阶级的思想必然要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发展;无产阶级在社会化过程中,“劳动变为商品,这种转变一方面把一切‘人的’因素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存在中清除了出去,另一方面,这一发展越来越把一切‘自然的’因素,任何一种与自然的直接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从社会形式中剔除出去,以至于社会化的人恰恰就在他的远离人的、甚至非人的客观性中表现为这种客观性的核心。恰恰是在一切社会关系的这种客观化,这种理论化和物化中,社会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才第一次清楚地表现了出来”<sup>[1]</sup>(第262—263页)。无产阶级上述历史地位的区别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意识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它超越了直接性,是对社会总体性的渴望,正是这种对于总体性的渴望,决定了无产阶级能够成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客体的统一。

#### 四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青年卢卡奇反对站在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看来,近代哲学把“认识论”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且认为不是主体和认识客体相符合,而是认识主体创造认识对象,可以说,近代哲学赋予人的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种理性主义哲学一当它力图把握世界总体时,它就必然会遇到“自在之物”这一障碍,这一点在康德那里有鲜明的体现。康德在认识论领域,把认识仅归结为对现象的认识,而无法达到对物自体的认识;而当康德进入了社会历史领域时,他又受到了人们所创造的“第二自然”,即社会的桎梏。因此,近代哲学实际上无法

解决主体和客体、自由和必然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那里,他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谈论人的实践的能动性的,因此,“实践”总是屈从于直观的理论的。只有马克思把“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从存在问题及其意义的层次问题向历史的现实的领域,向具体实践的领域过渡”<sup>[1]</sup>(第 199 页)。通过这种实践哲学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像近代哲学那样,把哲学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把握世界的绝对本体,而是把哲学关注的重心落实到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把人的价值和命运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实际上,青年卢卡奇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说模式,是以“自然或物质”作为基础,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寻求“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本质”为己任,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知识论模式的哲学”;而在卢卡奇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和进入到实践领域中的自然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把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作为哲学的任务,它实际上体现为以“人及其实践”为基础的文化哲学。也正因为如此,卢卡奇反复强调“总体性辩证法”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重要性,把“总体性辩证法”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中,只会使哲学丧失其应有的批判性和价值性,从而被淹没在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中。应该说,正是“总体性辩证法”决定了他的文化哲学的批判向度,决定了他的文化哲学必然会指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并展开为社会批判、文化批判、意识批判,而这又构成了他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他的“物化理论”、“阶级意识理论”可以说是他文化哲学的必然逻辑。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文化哲学形态的理论,是包括青年卢卡奇在内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特点。为什么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加以思考。

首先,必须联系 20 世纪西方哲学所发生的“语言的转向”和文化哲学的复兴这一大的文化背景加以思考。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既发生在英美哲学中,也发生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其共同点都是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逻各斯主义。所不同的是,英美语言哲学认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从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出发,要求对世界的共同本质和规律作出彻底说明,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狂傲和虚妄,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他们要求放弃对世界极终本质和价值的追寻,认为哲学就是要通过语言分析,来消除因语言误用而导致的各种“哲学病”,因此他们不是把语言升华到真正哲学的高度,而是把语言降到了工具性的层面;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则反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要求哲学,因此他们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阐释了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的生活经验,并力图通过语言的解释来阐释人文世界的意义,使哲学具有一种文化的功能。欧洲大陆哲学的这种“语言的转向”,使西方哲学家要求划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并逐渐发展到对整个西方传统知识论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构成了 20 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复兴。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转变,和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所不同的只是,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批判的主要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通过接受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学说,把哲学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

其次,应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他们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来思考。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始终是和西方革命紧密相联的。而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越来越从暴力统治转向了更多地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来实现。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体系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们通过宣传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控制和支配了工人阶级的需求,使工人阶级在“消费异化”中寻找幸福和价值的自我确证,因此呈现出其政治意识、革命意识日益淡化、弱化的趋势,按照卢卡奇的话说,就是被“物化意识”所支配,丧失了其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为找不到革命主体而感到困惑,这也是他们一再强调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价值功能,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原因。这就要求冲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解释,重视“实践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文化批判哲学。

应该说,青年卢卡奇的文化哲学,突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哲学的原则区别,并反对了唯科学主义的实证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他的文化哲学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当然,由于当时卢卡奇还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学徒期”,他的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若干失误。这既体现在他的“物化理论”中,也体现在他的“阶级意识理论”中。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价值贬损,人屈从于物这一现象。卢卡奇立足于捍卫人的价值和尊严,把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揭示了“物化”的种种表现形式,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注重市场经济中人的价值和命运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从理论根源上看,则既有马克思《资本论》对他的启发,也有马克思·韦伯、黑格尔思想对他的影响。但是由于青年卢卡奇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上述思想家对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正确揭示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物化现象的同时,也把“物化”、“对象化”、“异化”相混淆,从而把“异化”当做一个哲学人类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使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抽象人道主义的性质。同样地,他的阶级意识理论旨在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要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同时,还必须展开意识形态批判。这原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把无产阶级看做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客体,明显是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黑格尔那里,真实的东西既是实体,又应该是主体,实体和主体具有同一性,而这个主体就是绝对精神。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绝对精神外化,又回归到自身的过程。卢卡奇把黑格尔主、客体同一理论用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只不过这时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被换成了无产阶级,当能够无产阶级达到对资本主义物化结构的认识,具备了本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从而完成其历史使命。虽然从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定义看,他并不是在唯心主义地解释阶级意识的内涵,因为他明确肯定阶级意识是一定阶级对自身地位的理性反映,但是他的确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卢卡奇思想的上述缺陷,也正是他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长期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 [参 考 文 献]

- [1] 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责任编辑 严 真)

## On Cultural Philosophy of Young Lukacs

WANG Yu-c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64,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Yu-chen (196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majoring in Western Marxism philosophy.

**Abstract:** Young Lukacs animadverted on the positive explanation——pattern of Marxism of scientism, establishing the Cultural Philosophy on base of dialectics of totality and practice. His philosophy focused on social critique, cultural critique and ideological critique, while its fundamental value tropism was defending the value and freedom of human being. Young Lukacs' Cultural not only reconfirmed the researching objects and main principles of Marxism, but also expanded its research field.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culture; dialectics of totality; reification; class-consciousness